

中国古代海洋

小说与文化

倪浓水 著

ZHONGGUO
GUDAI HAIYANG
XIAOSHUO YU
WENHUA



海
军
出
版
社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与文化

倪浓水 著

海洋出版社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与文化/倪浓水著.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027-8285-6

I. ①中… II. ①倪…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3923 号

责任编辑:杨传霞

责任印制:赵麟芬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北京旺都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75

字数:225千字 定价:32.00元

发行部:62132549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次

第一章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审美模式	(1)
第二章	《山海经》:中国海洋小说的逻辑起点和原型意义	(15)
第三章	西山与东海:“精卫填海”里的南北抗争隐喻	(30)
第四章	古代海洋小说里的东海文化符号	(45)
第五章	神仙岛空间意象和海洋叙述的遥望视角	(62)
第六章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人鱼”形象的历史嬗变和文化 蕴涵	(74)
第七章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的“身行”构建	(87)
第八章	明清海洋小说中的商贾叙事	(101)
第九章	“海上女儿国”抢婚背景与《情史》“岛女繁殖叙事”	(111)
第十章	明清神魔小说与海洋	(121)
第十一章	《聊斋志异》涉海小说对中国古代海洋叙事传统的 继承和超越	(136)
第十二章	王韬海洋小说的历史品质	(147)
第十三章	古代海洋叙事中的“大人(君子)”意象营构	(156)
第十四章	《蜃螂城》、《北极毗耶岛》和《因循岛》里的政治讽喻	(166)
第十五章	“舟山民权村”:《狮子吼》里的“国家海洋政治想象”	(176)
附录	海洋笔记小说辑释	(185)
参考文献	(238)
后记	(239)

第一章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审美模式

所谓古代海洋小说，除了时间上的“古代”框定外，在笔者看来还包含着三层意义：

其一，题材上的“涉海性”。凡是叙事题材与海洋有关的，如海洋神的虚拟、海洋“人”的勾勒、海洋“事”的演绎、海洋“物”的文学化变异、海洋“社会”的寓言化存在等，都可以纳入海洋小说这个“类”的范畴。也就是说，海洋小说的故事内容、故事人物的活动空间，都必须要与海洋有关。这种有关不是指在文本中出现涉及海洋的只言片语，而是说海洋必须处于叙事的中心，或者立意上海洋处于观照、审视和隐喻的核心地位。

其二，指的是一种对海洋的思考和认识的方式。从现有的文物考古来看，中国的先民是在内地和沿海同时繁殖发展的。浙江河姆渡和舟山群岛的考古挖掘表明，海洋社会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也就是说，我国先民对海洋的体验历史极其漫长。那么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海洋意识？这些海洋意识又遵循着什么样的海洋思维而得以产生和形成？中国古代的正史对此几乎没有任何记载。古人的海洋思维就隐晦而曲折地投射在列代的海洋叙事之中，并呈现出一种历史的传承性。

其三，指的是一种与普通文学形式不一样的文学形态。这里主要是指海洋小说。这种“不一样”首先体现在文本形式上。还包含小说文本的特异性，那就是它们很少有长篇宏制，基本上都是以笔记小说的形式出现。有人可能会质疑，这种看起来是碎片性的、大多是简单的故事性的文本，难道可以算是小说吗？的确，古代海洋小说有着自己的文本形态，比如它的笔记体性、它的碎片体性、它的寓言体性、它的志怪体性，等等，使得它的文本形式显得很特别；其次，在小

说宗旨的追求上，海洋小说也与一般性的中国传统小说不一样。中国古代传统小说，讲究故事性这样的阅读功能和道德教化、处世训诫这样的教育功能；而古代的海洋小说，不刻意追求小说的故事性，也比较淡漠小说的训诫意义，却追求一种以虚幻、变异、象征为主要形态的海洋小说品质。

概而论之，即海洋题材、海洋思维和海洋表达。

因此，对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研究，既是一种文学的类型研究，也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海洋性质的文化研究。

一、悠久的形成历史

中国海洋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从时间的向度来看，其历史极为悠久，在一定的意义上例如从海洋题材、海洋思维这样的海洋小说元素上来讲，甚至还可以这么认为，它的产生时间比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还要早。

中国小说史专家杨义教授认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中，在神话传说形态的萌芽期和六朝志怪这样的初期小说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战国时期的“说”的时代。它体现在各个方面：在诸子的著作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叙事形式，那就是借助于各种真实或虚构的人物和动物故事，形象和生动地描述和表达各自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庄子的文章，更是如此；在当时的史学著作中，也普遍地运用了“说”的叙事手法，与“诸子小说”多偏重于虚拟性不同，“史学小说”立足于现实的真实性和典型地反映了小说对现实摹仿、提炼和描述的功能，因此文学成就很高。^[1]言下之意是，中国古代小说实际上不是产生于魏晋，而是时间更早的战国。就算此说得以成立，海洋小说也要比它早，因为在有“中国海洋小说之祖”称誉的《山海经》^[2]中，一些叙事已经是非常典型的小说了。例如《精卫填海》，虽然是高度概括性的，但其故事性、寓言性、相对完整性等都体现出比较成熟的小说品质。

如果《山海经》主要篇章诞生于先秦的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产生于先秦或更早的阶段。这就比一

般认为中国小说诞生于产生《搜神记》、《世说新语》的魏晋时代早了数百年。而与战国时期的“说”小说比较，也更有想象性、文学性，《山海经》自己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世界，所以更具有文学价值。

以《山海经》为代表的海洋小说元素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先秦以及远古时代海洋文学产生和发展的一个投影。从夏商周上溯到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其以神话、传说、寓言、诗歌、散文等文体出现的先秦海洋文学，“开拓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类别，开创了中国海洋文学的一个新时代。先秦远古时代那些渗透着海洋精神的文学作品，描述了远古先民与海洋有关的生产、生活、追求和梦想。浩瀚无边的海洋让他们惊奇、欢乐、收获，也让他们忧伤和迷茫。先秦海洋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激荡着远古先民走向海洋的心路，他们以坚强的毅力、聪慧的才智、奇异的梦想、非凡的创造力，不断探索海洋的神奇和奥秘，开拓海洋的交通和贸易，创造海洋的神灵和神话，开发海洋的资源和经济，充分展示出先秦海洋文学的时代特征。”^[3]

因此可以说，先秦海洋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是那个时代海洋文学产生和发展的有机组成。这种情形同样在以后的各个时期都有显著的体现。在汉魏六朝，海洋文学有了繁荣的迹象。汉武帝、汉宣帝时代出现了许多海洋大赋，后来形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海赋”系列，如班彪的《觅海赋》、王粲的《游海赋》、曹丕的《沧海赋》、木华的《海赋》、潘岳的《沧海赋》、庾闳的《海赋》、孙绰的《望海赋》、顾恺之的《观涛赋》、曹毗的《观涛赋》、伏滔的《望涛赋》、张融的《海赋》等。诗歌方面则出现了曹操《观沧海》这样的海洋文学经典名篇。“汉魏六朝海洋文学上承先秦文学并有所创新，尤其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描写、赞美和神往，并以全新的视角和方式、以海洋为题材的文学体裁诠释海洋这个神秘的世界。人们既看到汉魏六朝个体人格及自我生命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精神，又看到汉魏六朝海洋文学所折射出的那种充满新的眼光、蓬勃的生命力、斑斓的色彩、海一样的磅礴气势。表现出经略海洋的心理模式、寄情海洋的情感世界、崇尚海洋的英雄气势、赞美海洋的瑰奇壮阔、跨越海洋的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海洋文学品质。”^[4]在这样浓厚的海

洋文学、海洋文化的背景下，再加上秦汉两代活跃的方士文化影响，以“海上神岛”、“海上神仙”、“海上仙药”等为内容的海洋想象和叙事，也就随之繁荣起来。其中托名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和《神异经》里的“十洲五岛”、“焦炎山”、“鹄国”，张华《博物志》里的“浮槎”、“蛟人”，干宝《搜神记》里的“巨鱼”，王嘉《拾遗记》里的“西海之槎”、“沧波舟”等海洋小说，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表明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自觉”的时代。

二、复杂的发展形态

而以内容和品质的纬度论，中国海洋文学，尤其是古代海洋小说，也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貌，那就是它们并不体现为明显的向前发展的“进步性”，而经常性地出现回复、几种形态并存的倾向。这在文学史上是一种很罕见的现象。

中国海洋小说最初的雏形是以对“海洋之神”的想象和描述的形式出现的。庄子的《秋水》就描述了一个“北海若”的海神形象。在《山海经》和以后的“亚山海经”叙事中，海神形成了一个群体，成为各个海域的统治神。这些海神具有比较一致性的形象特征，他们人面鸟身，耳朵上拴两条蛇作为耳环，脚下还踏着两条蛇。显然这是沿海民族蛇图腾在海洋想象中的体现。另外也反映出古代先民对海洋充满了敬畏，因此对海神的描述视角是远远地观赏。这一远距离的观赏在中国至少延续了很长时期，在那个时候，我们先民觉得海洋神圣、怪异、神秘，绝非我们人类所能接近。《山海经》告诉我们，海洋是日出月升的地方，是神人居住的地方，就算不是神，那里居住的也是“大人堂”，是“君子国”。连其他生物也是充满奇异的，“有五彩之鸟”，有神兽，其状如牛，可是其“出入在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有一只鸟更厉害，太阳月亮的升沉都是由它负载的。另一种鸟则可以将人吞进肚子而飞翔千里。连海洋里的水族也让我们人类感到惊奇、害怕。有“大蟹”，有“人鱼”，后来发展为“大鱼系列”和“人鱼系列”，更有一种鱼竟然还能化为女人勾引异

性……海洋就这样成了神话的一部分。

神话叙事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叙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范式。与其他神话叙事一样，海洋神话的产生和流传的心理背景是人类对海洋这个审视对象的陌生、恐惧、敬畏和向往。其形态美学则是变异、想象和一定程度纪实的融合，因此艺术风格非常瑰丽、奇幻。船的出现根本性地改变了古人对海洋的认识，从而也改变了他们的海洋思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船桨表明，船已经存在了6 000多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等沿海国家已经有了专门的造船工场，已经能造出各种类型的商船、渔船和战船。其中越国造出的船已经能够负载二三百人，还有两层以上的巨舟。^[5]我们的先民坐着船这样的浮载工具进入了海洋，从事海上劳动、海洋探险和小范围的海上贸易活动（例如东海群岛上的海民经常来到绍兴的一个地方进行产品交易）。到了秦始皇时代，徐福的船队已经可以对北海和东海的广袤海域进行大范围的探寻活动。这些海上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擦去了大海神秘的面纱，让人类对海洋的敬畏之感骤然下降。反映在海洋叙事上，那就是奇幻和瑰丽的想象性虚拟构建逐渐被实际内容所取代。整个叙事思维大势从空中落到了实土。于是神话叙事的精髓一部分演化为《搜神记》、《神异经》、《博物志》这样笔记体小说里的海洋叙事，而大部分则随着海洋神秘感的消失而渐渐消散。

从凭借想象来解释和认识海洋的“神话性描述”，发展到以海洋志怪和传奇为特色的“笔记性叙事”，反映出古人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表露出他们海洋思维的模糊和矛盾。因为这些对海洋的“笔记性叙写”，虽然已经淡化了神话色彩，却仍然是以“变异海洋”而不是“原我海洋”为特征的。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一是由于“海洋活动”尚还不是古人的普遍性活动，大多数人仍然对海洋缺乏了解因而充满好奇；二是海洋体验者与海洋描述者的分离：生活在海洋里的人，没有能力描述海洋；而对那些具有“叙写海洋能力”的人来说，却都缺乏亲身性的“海洋体验”，所以只能沿袭一些有关海洋的神话、传说来充当叙述资源。可是随着对海洋潮流和气候的进一步掌握和驾船技术的娴熟化以及指南针的发明，情况起了变化。进入唐宋时代后，对海洋的探索、认识和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沿海地区以及海中岛屿的居住人口也大幅度增加，涉海民众成为开发海洋的群体力量，而海洋资源也成为人们重要的生存依赖。据统计，唐代山东沿海地区的人口已接近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他地区的沿海人口也明显膨胀。这说明我们的先辈，“开始冲破陆地文明的方位束缚，启动更为广阔的海洋视野，面对海洋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世世代代的涉海奋斗，积累并传递了丰富的海洋知识和海洋文化，海洋因素强力渗透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了海的冲击，看到了海的未来。”^[6]进入明朝后，中国海洋经济、海洋文化进入高峰时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洋实践活动，完全打破了原先由《山海经》等海洋叙事书写的“海神、大蟹、鱼人和奇鸟”组成的海洋世界格局，海洋的神秘和神圣最终被不可避免地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人类有了像在陆地上一样的主人的感觉。也就是说，“现实海洋”已经逐渐取代“想象海洋”。因此从宋代开始的海洋小说叙事里，对海洋和岛人的占有、欺凌之类的题材大幅度上升了。在冯梦龙《情史》中的《焦土妇人》和《海王三》中，岛女成了被陆地人始乱终弃的对象。在凌蒙初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及李渔的《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财成巨富》中，海洋即财富成了一个新的海洋叙事主题。

“海洋”就这样被日益频繁的海洋活动日趋世俗化，成了现实空间世界的一部分，再也没有什么奇异可言了。可是奇怪的是，这时候以及以后的海洋叙事，却并不是按照我们的预计，完全都变成了现实主义的。综观这个时候的海洋小说作品，除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叙事仍然继续着“笔记海洋”的文学品质外，还继承了《山海经》“君子国”、“大人堂”这样的“海洋想象”和“海洋圣洁”传统，并将之扩大为“海洋神圣——海洋宗教”的神道叙事，也就是中国海洋小说特有的神、魔和海洋相结合的神魔小说。明清时期神魔小说的繁荣反映出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从科学理解又回到了文学体会。海洋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和象征对象。当然这不是认识的倒退，而是对海洋的理解进入了文学象征的层次。《西游记》是这方面伟大的代表。那个神圣、庄严、佛法无边的南海紫竹林世界，使整个物欲横流

的人类活动环境最终得有一种圣洁和清醒之音永远弥漫。而紫竹林在南海（实则为东海）的空间构置，则产生了一种极具意味的认识暗示：这种圣洁的声音和伟大的力量来自于海洋！

三、三种发展模式

以古代海洋小说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学，就这样走着自己发展的路，就这样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很漫长，却又很单薄。“漫长”是指它的历史风霜性，有着数千年的年龄，可是年龄的苍老却并没有帮助它修炼得很丰满，恰恰相反，它很单薄。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历史之迹并不明显，甚至还经常性断裂，许多发展时期充满了空白，可是它又始终没有灭绝，在断裂了一段时间后，又逶迤而来。因此它就有了自己的“历史”，虽然它从来没有独立过，却一直具有自己的轨迹和特色。

而“历史”是需要阐释和描述的。当然，“历史只能参照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来写，这些价值系统则应当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7]因此我们要关注海洋小说“历史”本身，就必须通过这“历史”，来窥探中国的海洋文化密码、古人的海洋心理、海洋精神脉络，以及古人的审美智慧和叙事原则。并进而依据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异质性（与西方海洋文化相比较），探索具有中华特色的海洋小说叙事体系和海洋文化体系。

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属性。为了使这种把握具有宏观视野和全球意识，我们在这里将借用法国结构主义学者托多罗夫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文学史有三种存在形态，可以用三个隐喻来表示，那就是“植物模式”、“万花筒模式”和“白天黑夜模式”。所谓“植物模式”是指“文学机体也像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一样诞生、开花、衰老并且最终死亡”；所谓“万花筒模式”是假设“构成文学作品的各种要素是一次给定的，而作品变化的关键在于这些同样的要素的新组合”；而“白天黑夜模式”则把文学变化“看作昔日的文学与今日的文学之间的对立运动”。^[8]如果仔细考察这三种模式，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种“植物模式”和第三种“白天黑夜

模式”有相似处，即都认为文学的发展是进化的、历时的，而第二种“万花筒模式”则认为文学是一种变化而非发展，虽然有时间的流逝而实质上乃是一种“共时”而非“历时”。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史态”应该是历时和共时的共同存在，也就是说，在先秦至晚清的长达数千年的海洋小说历史中，“植物模式”、“万花筒模式”和“白天黑夜模式”都实际存在着。

（一）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发展的“植物模式”

“植物模式”聚焦于小说发展的历时性。对于中国古代海洋小说而言，这种历时性主要体现在一些叙事内容类型的“代代传承”上。由于“海洋”这个叙事对象具有同一的固定性，古代海洋小说的诸多文本在内容上体现出多种类型化趋势，从而构成了一些叙事系列。而对于这些系列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呈现为发展的“植物模式”。譬如“海上神仙”叙事，从《山海经》的“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等四海“海神”形象，庄子和列子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姑射山神人”，到列代笔记小说中的各种神仙岛上的神仙故事，如“渤海五山”的神人、“鹄国”里的“七寸”男女、“海内十洲”里的神仙、“年年八月浮槎”来去的奇人，一直到宋张君房《缙绅脞说》里的“蓬莱女”，明冯梦龙《情史》里的“猩猩女”、“蓬莱宫娥”，清蒲松龄《安期岛》、《仙人岛》里的神仙，等等，在叙事内容上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种一脉相承并非是重复，而是体现出一种“萌芽—发展—衰落（指神仙越来越凡人化）”的趋势，这是符合“植物模式”的发展形态的。

（二）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发展的“万花筒模式”

“万花筒模式”聚焦于小说故事元素的组合情形。由于故事元素“是一次给定的”，也就是说这些元素是基本稳定的，不会有数量上的大增大减，所以更适合内容类型化的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但同样是内容类型化的系列海洋叙事，古代海洋小说中“大鱼”系列的发展情形却与前述的“植物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山海经》里的“大

鳊”、“大蟹”，干宝《搜神记》中的“数见大鱼”，冯梦龙《情史》中的“大鱼”，一直到清乾隆、嘉庆时期的袁枚《续子不语》中的“吞舟大鱼”和慵讷居士《咫闻录》的“海中巨鱼”，虽然历经数千年，可是其对“大鱼”的描述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变化的只是时间、地点等一些次要性元素的线性流逝和简单改变，显然是符合“万花筒模式”的。

（三）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发展的“白天黑夜模式”

“白天黑夜模式”是对同类不同时的小说文本的聚焦。古代海洋小说另有一类比较系列化的海洋叙事适合充作这种聚焦的审视对象。例如“人鱼叙事”。《山海经》中的人鱼为女性，《搜神记》和《博物志》中的鲛人也为女性，而到了清人沈起凤《谐铎》中的“鲛奴”，则发展成为男性，呈现出对立状。所以这种“人鱼叙事”是比较符合“白天黑夜模式”的。

因此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模式非常丰富，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它的发展仍然以进化性为基本特色，也就是说，“植物模式”是主要的存在形态。“海上神仙叙事”、“人鱼叙事”、“遇风暴船般漂流至岛叙事”、“寓言海洋叙事”，这些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最主要的叙事模式，都呈现为历时的、进化的、发展的面貌，是符合“植物模式”特征的。

四、四大审美形态

“植物模式”、“万花筒模式”和“白天黑夜模式”，虽然是一种舶来的概念，可正如上面所分析，将它们揆之于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竟然十分吻合。这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惊喜，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在世界海洋文学话语里的普遍性价值。然而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一样，海洋小说也是在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纯中国化的环境里产生和发展的，我们的考察必须坚持中国立场。因此，我们还需要正确把握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叙事特征，从而衡量其独特价值。

与恢弘激荡、主体感和“在场感”强烈的西方海洋小说叙事相比，中国古代的海洋小说叙事呈现出自己鲜明的审美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遥望性

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望”、“观”特征，曹操《观沧海》、沈约《登碣石》、刘峻《登郁洲山望海》、祖珽《望海》、虞世基《奉和望海》、吴筠《登北固山望海》、独孤及《观海》等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到了航海业非常发达的明代，仍然“观海文学”大流行，如毛纪《观海》、周瑞昌《观海》、王思任《观海》、俞安期《望海》、任万里《观海》、仇祿《观海》……

这种“遥望”视角的产生来源于作家们根深蒂固的内陆文化思维定势。在古代文化传统中，“家园”是根植于土地的，人们思维的观照对象也是“陆地”。“中原”产生了“中华”，海洋和沿海地区则是“夷地”。而海洋则是作为一种文学意象性空间而存在。虽然海洋里面有实际性的岛人、“海人”在生活、在劳作，可是这些生活和劳作于海洋上的“人”自己是不会表达对海洋的体验、感受和经历的。而运用文学手段反映海洋的作家们，却是生活在远离海洋的陆地上，他们来到海边，更多的是一种观光客身份，他们对海洋没有亲身的体验，因此他们只能用“观和望”来审视海洋，而无法将海洋“经历化、经验化”。

正因为作家们没有“进入海洋”，他们只好站在海边“遥望”海洋，对海洋的一切描述和反映，自然只能采用“想象”的办法。这种“遥望”视角在最早的一批海洋小说里已经被确立。作为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之祖的《山海经》，是这种“遥望”视角的滥觞。《海经》中介绍、描述的各个“海国”，地理位置模糊，海人形象怪异，显然不是“经历”性见闻的产物，而是站在海岸遥望汪洋的一种“文学性想象”，如《海外南经》和《大荒南经》中出现的“长臂捕鱼人”，分明是海人在使用鱼叉捕鱼，可是由于是站在岸上，远远看去，鱼叉被“看”成了手臂，所以也就成了“长臂人”了，进而还想象出一个“长臂国”来。

庄子和列子“强化”了这种“遥望”视角。他们笔下的“列姑射神人”，其原型或许是远处岛屿山顶上的一朵白云，在风的影响下，白云在不停地变化，幻化成各种形状，也许看起来很像是“人”的形状，可是他们都知道岛上是没有人的，人也不会那么高大和善变，因此肯定是神，再加上一些主观想象和气质、功能补充，一个“岛屿神人”就这样创造出来了。而庄子“望洋兴叹”的文学创造，更是典型地使“遥望”视角成了一种定势。

所以说，对海洋的“遥望”描述和反映有浓郁的文化背景，同时也是当时对海洋的陌生而感到神秘的一种心理的反映，后来渐渐地成了一种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审美常态。尽管后来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海上活动的增多，海洋的神秘感早已不复存在，所以“遥望”视角照道理应该被“亲临视角”所取代，可是作为一种文学美学意义上的叙述立场，这种“遥望”视角一直到海上活动高度活跃的明清时代，仍然在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说明这种叙述视角有它存在的内在原因。如果联想到《聊斋志异》、《子不语》等笔记小说大量描述的“海鬼”、“海怪”、“海人”等奇异世界的文学事实，那么我们认为这种原因是不难理解的，那就是人性需要“海洋想象”，事实上海洋的大规模被认识与这种“想象海洋”的存在并不矛盾。

（二）寓言性

正因为是站在海边的“遥望视角”，因此古代海洋小说里出现的海洋，基本上都不是现实海洋、实际海洋，而往往是意象性、象征性海洋，对海洋的想象支持着作品“海洋世界”的叙事向度。所以这个“海洋世界”是变异的，也是主观的。

海洋意象的丰富和深化就变成了哲学，因而这种海洋小说叙事也就变成了寓言的形态。《山海经》里的海洋神话同时也是海洋寓言，里面出现的“大人堂”、“君子国”意象直接影响了后世《镜花缘》和《常言道》有关“君子国”的叙事。发展到明清时代，甚至一直到了晚清，海洋小说的寓言性演化成为一种政治寓言小说。地理海洋也从美学海洋发展成为政治海洋的寓言。《蜚螂城》（沈起凤《谐铎》）、《北极毗耶岛》（官鼎《雨夜秋灯录》）和《因循岛》（王韬

《淞滨琐话》),以及晚清的《狮子吼》里的“舟山民权村”,无一不是借海洋为空间背景的政治寓言小说。

作为意象寓言性质的古代海洋小说,除了“政治海洋寓言”叙事模式,还向“宗教海洋”方面发展。“宗教海洋”是佛和道的混合。在《西游记》中,佛为主,佛教力量的主要代表观世音的道场就在东海上,而东海龙王等传统意义上的道家分子,虽然根据地也在东海上,但其地位和影响力显然无法与观音道场相比。但在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和吴元泰《上洞八仙传》等以海洋为背景的神魔小说里,道家则压倒佛家成为主角。

(三) 笔记性

我们说《山海经》为中国海洋小说之源,而其同时又是公认的古代笔记小说之祖。因此反映在文本形态上,古代海洋小说的主要成分乃是笔记性。《山海经》本身就是笔记体之父,自不必说。《庄子》的《北溟有鱼》、《神人》,《列子》的《列姑射山》、《好沕鸟者》、《渤海五山》,《神异经》里的《焦炎山》、《鹄国人》、《海童白马》,《搜神记》里的《数见大鱼》、《鲛人》、《东海君》、《蚁王》,《博物志》中的《八月槎》、《鲛人》,《拾遗记》的《西海之槎》、《沦波舟》、《含涂国》等等,还有《水经注》、《广异记》、《酉阳杂俎》、《癸辛杂识》、《坚夷志》等30多部古代笔记小说和杂记中,都保留了大量的海洋小说,经我们初步稽寻,已经整理出海洋笔记小说100多条,几乎占了古代海洋小说全部篇目的90%左右。

这些笔记体海洋小说虽然只有“片言只语”的规模,但它们仍然都属于小说,因为一者,它们具有虚构性质;二者,它们虽故事简单却仍然具有相对的情节完整性;其三,这些笔记小说都很好地将“作者”与“故事人物”或“故事行动素”进行了分离。而这三者,乃是小说的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内涵。

(四) 程式性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缺乏专一性作者,也没有在某个时代特别发达的阶段性的繁荣出现,因此碎片化和历时性是基本的面貌。但是在叙事上,它们却并不是碎片化的,而是呈现出某些类型化特征,有些类型

甚至还具有叙事模式的典型性，这种叙事模式从《山海经》开始一直绵延到了明清的海洋小说，主要有“海洋神仙岛模式”、“人鱼模式”、“海上遇风暴漂流至荒岛模式”、“海洋国模式”等。这些叙事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证明着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看起来虽然凌乱和碎片化，其实也有着自己内部的发展规律和故事规范。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征，具有独特的美学和文化价值。但是不可否认，与源远流长和极其灿烂的古代其他文学传统相比，古代海洋小说处于一种边缘性地位。或者说在中国文学的地域空间版图中，“海洋地域”一直是被忽视了的。^[9]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一个以海洋为题材主体进行写作的古代作家。就算到了航海业非常繁荣、从事海上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对海洋的认识和体会也越来越深刻的明清两代，海洋小说并没有因此而跟着繁荣。不但如此，从这个时期的海洋小说来看，海洋题材的叙述仍然是以笔记性、志怪性为主，并没有结构恢弘、想象奇特、海洋精神突出的西方式海洋小说这样的创作成就，这是很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当然我们绝对不能认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作出的“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可能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的论断，因为这个论断显然是以西方海洋文学和海洋文化的要求来衡量中国的海洋文学和文化，他没有看到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和文化独特的诗意和价值。整理、挖掘、分析和总结这份独特的诗意和价值，正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地方。

杨义先生在全面考察了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价值后指出，“叙事学研究必须如实地承认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化生成系统，以便使研究者的眼光回归和集注于这个系统内在的深层。在两三千年绵延不绝而又自成格局的社会文化行为和审美文化环境中，中国叙事文学以丰富的经验和辉煌的成就，形成了自身具有显著特色的体制、模式、趣味和评价系统。这个体系尽管由于包含有人类共性而与西方体系存在着重叠互证之处，但更有本质意义的，是它携带着自己的文化系统而与西方体系存在着偏离和异质、相互间构成了对峙而又互补的张力”。^[1]这里的分析如果用在古代海洋小说身上，我们认为恰恰是非